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12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2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曾毓隽(1)
西原借款	周叔廉(7)
曹錕贿选总统始末	王 坦(20)
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	邓汉祥(31)
齐、卢之战纪略	马葆珩(38)
臧致平、杨化昭自闽突围入浙记	张义纯(52)
冯玉祥督豫前后	刘 骥 邓哲熙(62)
曹錕和王承斌的关系点滴见闻	潘承祿(66)
鸡公山会议的前因后果	马彦肿(69)
国民二军与镇嵩军之战	张 钫(75)
直系军阀大联合的酝酿和失败经过	孟星魁(88)
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	杨文恺(92)
杨宇霆督苏被逐记	刘翼飞(101)
郭松龄反奉亲历记	魏益三(107)
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	王之佑(116)
附赵毅关于本文的补充和订正	
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的勾结	阮振铎(142)

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	吴锡祺(150)
东北边业银行始末记	韦锡九(158)
张作霖二三事	栾贵田(175)
吴佩孚过甘见闻	韩定山等(178)
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	陶 莽(192)
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	谭志清(202)
1924 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	溥 佳(220)

附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	(24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	
.....	(254)

附注

对《曹锟贿选总统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	
对《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	
对《齐、卢之战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第五十一辑	
对《杨宇霆督苏被逐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对《张作霖击败郭松龄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曾毓雋

袁死黎继之经过

1916年5月袁世凯病笃，知帝制不可为，有悔意。先由袁之于夫人以电话告段祺瑞之张夫人，谓元首抱病，急于一晤芝泉，汝先疏通，即有后命。盖张夫人系于夫人之义女也。张夫人为前江西巡抚张芾之侄孙女，父名瀛，字步洲，在山东与袁交好，步洲早逝，母陈氏不两年亦去世。于夫人抚养张女如己出，段元配吴夫人逝世，即由袁夫妇主婚，以张女归段为继室，往来甚密。段在1915年5月31日，因反对袁之帝制，在陆军总长任内引病开缺，给假两月，并颁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段乃在家闭门谢客。得于夫人电话之次日，政事堂果传话邀段。段到，徐世昌已先在座，我亦随段同往。因段谓我知医，在旁察言观色，便知病之轻重。袁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后一大院落中。袁在病榻上接见，面色红赤，说话气力尚照常，案上所列皆中医脉案与药方。袁对段云：我老且病，悔不听汝言，故有今日，取消帝制汝可相助为理乎？段云：当竭力相助，容与东海熟计之。稍坐即离去。

1916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仍照民国元年官制组织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不久因徐世昌辞国务卿职，以段继之，即电南京冯国璋商挽大局，于是有南京会议之召集。不料南方进一步促袁下野，冯、段正在疏通；而北洋系督军亦渐不听命，四川陈宦、湖南汤芑铭等，先后通电反对帝制。外交陆征祥、财政孙宝

琦，相继辞职。袁病势愈殆，群医亦告束手。

段派我赴南京以详情及大局形势面陈冯国璋，并商以袁死以黎继之事。当日安徽督军倪嗣冲亦在南京，对我质问云：“汝在幕后帮助段合肥反对帝制。”我答云：“我乃闲民无常职之人，又非袁党，有何能力反对帝制。至于段之反对，乃段个人见解问题，我不能左右之。至于今日我奉命来此，因袁病重，命在旦夕，商量继任人选问题。今日不是反对帝制。”倪始无言。冯国璋等亦认为黎本为副总统，顺理成章，非他莫属，乃复电赞成。6月6日袁逝而黎继。

黎、段矛盾与府院之争

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后南方各省一律主张恢复约法与国会，而海军李鼎新竟有独立宣言，要求恢复国会。段迫于当时形势，亦无可奈何。1916年6月29日，黎令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并召开选举副总统大会。冯国璋当选，议宪开始，气象一新。但有部分国民党议员，欲结黎倾段。此次组阁本属混合制，国民党阁员及议员居多，故多数拥黎，而黎顿觉局面迥非昔比。双方左右媒孽乘机挑拨，府院之间冲突愈形尖锐。孙洪伊以阁员身份，日在总统府指挥一切，徐树铮心尤不平。适中国银行为兑现，借到美金五百万元，言明按九一交款，未与银行团商量。此事本系阁议秘密通过，亦为黎所赞成，而孙洪伊将此消息漏泄之。报纸竟将原条文宣布，五国银行团来函抗议。市面先时中国银行票价，仅四五折左右，若能保守秘密，则借款到手，暗中逐渐收回中票，则此项借款可于中票收回后，尚可留为整理善后之用。但孙洪伊泄之，引起外交抗议，风声所播，市面中国银行票价陡涨至八折以上，故又费尽力量，中行始克兑现。徐树铮又搜得情报，谓孙洪伊之为此，因其个人先以贱价收买中票，故利于未兑现前中票先涨价，借获厚利，损公利己。故段认

为此人不能共事，去孙之意甚决。而徐树铮与孙洪伊，因此事在阁议时互相冲突。府中则每以无关系之用印小事多方指摘，以致狂躁之徐树铮难于相容，府院之间成见日深。黎素不满徐树铮之跋扈，亦欲去徐。乃由许世英主张，作孙、徐两罢之议。于是孙洪伊免去内务总长之职，徐树铮免去国务院秘书长之职，以张国淦继之。因张国淦系湖北人，利用其调停府院之间关系，以为从此可苟安矣。

不意一波初平，一波又起，徐树铮与许世英本无怨无德，此次徐之下台，发动在黎，徐迁怒及许。因许世英画蛇添足，于事后以一函致段，函中谓徐树铮学识精力尽有过人之处，但彼既弃文学武，宜就其所长，加以驱策，政治非其所长，不如任以武职；且彼门户之见稍深，与段兼容并包之旨亦不相合，武职尽多要津，若能用其所长，则所以保全树铮，亦即可以保全总理，云云。在许以为词甚婉转，在段视此函为平常，并未秘藏。不料此函又为徐树铮所见，大中其忌，谋以报复。

适交通部与各路局局长以运输快车有租车互议，租约五年，每车每日以三元计租，照市价约值一千八九百元。按三元计租，则车商不到两年本息即可相抵，所余三年多，租价皆属盈余。且洋商揽售运输车者甚多，亦可分期还款。租车之议弊端太大，而彼辈犹以每日三元为未足。商人系金荫涂、鲍星槎新立公司，递呈到部。及次长王黻炜将原呈内三字改为四字，且眉批云：“部章各局互相调用，车辆系每日每辆作价四元。此件退回。”金鲍两人本系架空生意，即以此件示各洋商，盖表示其门路甚宽，以便向各洋商赊账也。不料各洋商将其原件用照相机拍照，留存此照片。如何又落于徐树铮之手。则不可知。

先是四五个月以前，许世英忽向段前请派我为京汉局局长。因当是时我正在国务院任秘书，我表示不愿就，与许同在段前交涉。许谓：“屈汝为局长，为我作耳目也。”段遂劝我暂就，为许帮忙。至租车之议垂成，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三局长，以合同见示，且约联名。我立时却之，且告以租价惊人，须知车非路轨何能运输，一切

费用在内，故每日定为四元；且各局互调，报销归部无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车，何能引此例为比较。外议沸腾，嘱其谨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谓许隼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见。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许宅，谓许已四处寻我。因彼已得王家俭报告，我推却签此合同。于是许垂询及对此事意见。我乃以此事决不可办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祸在目前。我闻徐树铮已将王黻炜通同舞弊之确据，日内必定在检察厅起诉，并告其金、鲍等人新组织之公司，虚有其表，彼原系德商买办，大战后失业，故冒险作此勾当。许谓此等内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参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长曾鲲化查办。雷秘告王黻炜，即夕潜逃。次长既逃，遂将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等正、副局长送法庭办理，许一面对黎、段自请处分，求去。经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終了。徐树铮去职之后，在府院之间，尚引起此一段风波也。

黎、段失和主要原因

黎就职后，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拥戴继任大总统，宜可欣合无间。故就职之初，意见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等，所谓四大金刚是也，从中挑拨作梗；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拢，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员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说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经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绝邦交，国务院即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燮、张国淦等为评议员。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约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给物资、改正关税、巴黎经济同盟以及将来在议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项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段租权，停付德国赔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

施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绝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已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势因此紧张，不免棘手。而协约国劝诱参战者纷至沓来，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驻外各使，电告协约国对条约修改、缓付赔款等均允许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紧张，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张，更为坚决。若黎元洪在袁世凯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暗弱，惑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说；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则更为危险。适此时国民党议员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议外交，简而言之，即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暗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亦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未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虽经段召兵警将公民团解散，而多数议员借为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作为对参战案之消极抵制。

徐树铮事事占先，独于对德宣战抱消极态度。因徐素日崇拜德国，谓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守中立。有一次徐树铮为参战事，又上书段氏，段当面将上书弃之于地。以后又发现徐树铮暗中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示意，嘱其电请中央维持中立。及段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各督军皆拥护宣战政策。据倪、王并称：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徐树铮遇事与总统为难，独于参战与黎看法相同。于时各督军曾邀两院议员在外交大楼当面疏通参战事，并面陈黎总统。黎认为此事应由议会主持，非督军所应干涉。而议员则仍保持消极态度，尚以法定人数不足作借口，故无法开会。各督军以一电攻击宪法之歧误，相率从容出都。段在平时一怒便拂袖而去，此次为力争参战，偏倔强不退。黎乃毅然

将段免职，以伍廷芳署总理。各省始则通电指责副署违法，继则通电独立。当此是非纠纷之际，徐州又召开督军团会议，复辟之谣已炽。黎不但不闻不问，反明令张勋随带八千兵入卫，复辟之机伏矣。

西原借款

周叔廉

西原借款一名词，人多知之，但是知道它的内容及详细情况的可能并不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登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稿，似乎还不够详细，其借款数目亦小有出入。至于说当时段政府对日借款总数共达五万万万元的数目是不确的，实际并没有这样多。我对这个借款稍为知道一点，特为详细介绍一番。但是，阅年较多，可能有记忆错误的地方，希望知道的人加以指正。

属于西原借款范围内的各项借款及其条件

(一)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

1917年1月20日由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协理任凤苞与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以下简称三银行)代表日本兴业银行理事二宫基成签订。期限三年，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及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三项共七百七十二万五千六百八十七点六八元。

(二)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7年9月28日由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协理任凤苞与三银行代表日本兴业银行理事志立铁次郎、台湾银行理事山成乔六签订。期限三年，实足交款，利息年息七厘半。担保：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二千五百万元。

(三)有线电报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4月30日由交通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輿签订。期限五年,实足交款,利息年息八厘。担保:中国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

(四)吉会铁路垫款日金一千万。

1918年6月18日由交通总长曹汝霖与日本三银行代表日本兴业银行代理总裁真川孝彦签订。期限:吉会铁路正式借款成立尽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五)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日金三千万元。

1918年8月2日由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輿、专务理事柿内常次郎签订。期限十年,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半。担保:吉黑两省之金矿及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

(六)满蒙四铁路^① 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银行代表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期限:于满蒙四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后募得基金优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八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七)高(密)徐(州)、济(南)顺(德)铁路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银行代表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期限:于两铁路正式借款合同成立后募得基金优先偿还。实足交款,年息八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八)参战借款日金二千万元。

1918年9月28日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三银行代表朝鲜银行总裁美浓部俊吉签订。期限一年,实足交款,年息七厘加贴现用费

^① 四铁路:1.热河至洮南;2.洮南至长春;3.吉林至开原;4.自热洮路之一点达于海港。

一厘。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另有换文指定以将来整理新税之收入作为偿还财源。此借款指定交付于直接主管国防军队机关所属之经理主任。

以上八项借款总计日金一亿四千五百万元。

日本对西原借款的政治背景

日本大隈内阁以强硬手段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交涉，遭到中国人民一致的激烈反对，因此极为日本元老派和其他持重稳健人士所不满，就以对华外交办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继任内阁首相为寺内正毅，是元老山县有朋的嫡系人物；外务大臣为本野一郎，大藏大臣为胜田主计。他们鉴于前内阁之失败，为谋改变其政治面貌和政策路线起见，挂出“中日亲善”的牌子作为对华外交方针，以期改善中国人民对日之情感，缓和欧美各国之空气，乃以大量借款贷与中国，条件并不苛求，以示“亲善”之诚意，而扫除原来之误解。此为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的第一个原因。

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自从袁世凯死亡以后，恢复旧约法，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治大权掌握在段的手中。段祺瑞是北洋军阀派的一个实力首脑人物，为人十分刚愎，对黎的总统不能尊重而合作，致酿成府院斗争，张勋因之乘机而有复辟之役。讨平复辟之后，冯国璋继任总统，段复任总理。日本的寺内内阁看中了段祺瑞这个人，认为一定可以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是，看到段的武力财力两项都还不够，乃专心一意援助段氏，扶植其实力帮助他成功，好为将来挟持侵略的工具。这是寺内的政策，是十分坚定的。他对于中国其他的军阀如冯国璋、曹錕等人，从来也没有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非常彻底而毫不摇动。此时西南各省已经是形同割据各自独立。日本乃充分给段以财政上的援助，帮他建立参战军队（欧战结束后改为边防军），作为段的基本军事力量，好让他完成武力统一的愿望。这是

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的第二个原因。

那时日本已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但中国尚未参战仍是中立的立场。日本深恐中国被德国所诱惑，如把中国丰富的资源及劳动力供助德国，这对于协约国方面显然将大为不利，因此不能不尽力拉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一同对德奥宣战。所以西原在奔走借款的同时，也努力促动中国参加欧战。这是日本西原借款政治背景第三个原因。

日本对西原借款的经济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苦斗的结果，替日本工商业造成一个高利润大发财的机会。对外贸易大大出超，国内货币过剩，形成通货膨胀的局面。财政界的首脑人物为了制止财界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必须设法紧缩通货方可收功。因此，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减少国内筹码的充斥。那时期日本曾先后向英国承受国债日金二亿八千万元，向法国承受国债日金七千六百万，向俄国（帝俄）承受国债日金二亿二千二百万元。对中国除了上述西原借款之外，尚有通过其他途径缔结的各种借款如次：

1. 善后借款第一次垫款日金一千万；
2. 善后借款第二次垫款日金一千万；
3. 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日金一千万；

4. 直隶水灾借款日金五百万元（这一笔借款是由中日实业公司总裁李士伟代表日本兴业银行、中日实业公司等十一家财团组织的银团与中国签订的，并没有经过西原之手，所以不能列入西原借款之内）；

5. 吉长铁路垫款日金六百五十万元。

此外还有其他零星的地方性借款和专业性借款很多，并有与美国合放的中美运河借款美金六百万，总数共达日金六千二百六十万元、英金五十三万六千磅、美金三百万元。这是日本西原借

款经济背景的第一个原因。

日本一直垂涎着中国无穷尽的丰富资源，欲加染指进行侵略。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硬索手段遭到失败之后，不得不改头换面从借款修好的手段来谋求经济合作，再逐步实行掠夺中国的资源。这是日本西原借款经济背景的第二个原因。

西原借款日本方面出面承借的银行

日本是四国大借款银团成员之一，受到银团的拘束。当时日本在外交方面对英美两国显然都还存有顾忌。若单独对华大量借款，深恐引起国际上的诘责，故除了秘密办理之外，还必须避开国际银团的关系，因此决不能由参加四国银团的正金银行来出面。经过研究之后，台湾银行和朝鲜银行都是特种银行，朝鲜银行在朝鲜和东北都享有金票发行权，两行在华北华南都有不少分支机构；日本兴业银行也是特种银行，专营长期投资业务，又有发行债券的特权；故决定由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联合起来担任出面。同时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做好基础，又向中国提议创立中日合办的银行，得到中国方面同意，成立了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于1917年8月成立，1918年1月开业之后，对于有线电报借款和金矿森林借款两笔并由三银行委托中华汇业银行出面签订，都是为了避免列强的注意。

西原龟三

寺内正毅曾任朝鲜总督多年，胜田主计帮他在朝鲜主持理财工作，西原龟三也是跟随寺内在朝鲜工作和策划的人，因此他们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寺内、胜田对于西原全都十分信任，可算得是言听计从。寺内组阁之后，胜田出任大藏大臣，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

不采纳接受。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寺内决定采用“中日亲善”政策之后，就派西原全权奔走联系，先后缔结了一系列的各种借款条约，总数共达日金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就是世所熟知的“西原借款”。

章宗祥写有《任阙斋回忆录》（是稿本，并没有刊印），曹汝霖写有《民初外交回忆录》（曾刊登香港的一个小报上），其中均有关于西原借款的叙录。两人都是西原借款的经手之人，其资料自具有参考的价值，兹分别摘录于下。

章宗祥在《任阙斋回忆录》中写道：

“我奉命使日启行前，由日本驻华武官阪西介绍西原来见。西原说寺内不久将组阁，主张一反从前政府的态度，彻底实行两国亲善。我与西原当时并未深谈，以为亲善之谈不过是门面话而已。及到东京，寺内内阁成立后，西原又来见，重申亲善之说。他说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全国的责任，这个人就是段祺瑞。段现任总理，正在筹划统一南北。要做好这件事，第一要有相当武力和充分的财力，这两点段现在还很不够，日本如果从这点进行，于段必极为有利。军备首先是要钱，所以应该从经济上着手才是根本办法。在当时，中国各处都有大隈内阁所遣派的浪人在各地方兴风作浪尽情捣乱，尤其是山东胶济沿线一带更闹得凶，这个让主办交涉的人感到十分头痛。余曾托西原向寺内转达中国方面对浪人加以取缔召回之希望，结果立刻下令召回各地浪人，一律限期回国，始稍稍异之。过一天西原又来谈，中国要整顿财政首先需要一笔款子，中国如要借款，日本可以想法。我答以中国向来借外债都有回扣，因此不愿与闻致蒙瓜李之嫌。他隔几日又来说，你的顾虑日本已研究出一好办法，就是借款十足交款不给佣金，如此经手的人显然就可以干净了。我因此为他介绍成就了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日金五百万元。以后西原径往北京接洽，陆续成立各种借款，就是内外宣传的所谓‘西原借款’。又因借款汇兑必须经过银